

辛亥人物论集

XINHAIREN
WULUNJI

饶怀民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辛亥人物论集

饶怀民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辛亥人物论集 / 饶怀民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6—02454—3

I. 辛 ... II. 饶 ... III. 辛亥革命—人物评论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584 号

责任编辑: 李德奇

封面设计: 宋武征

辛亥人物论集

饶怀民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滨河东路 296 号)

陇西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92 千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7—226—02454—3/K·421 定价: 25.00 元

序

当我们告别 20 世纪、跨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迎来了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

1911 年 10 月 10 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68 年之久的清王朝,从而也就结束了统治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毛泽东同志曾经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11 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80 周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英烈们未竟的事业,而且将其发扬光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诚如毛泽东同志在 1956 年所预言的:“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1 页。)今年正是“二千零一年”,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预见是无比正确的。如果说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腾飞的话;那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腾飞;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党

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则可视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三次腾飞,回顾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三次巨变,展望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美好前景,我们心潮起伏,豪情满怀,对未来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由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人民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27 页。)因此,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的历史事件。毫无疑问,推动这场历史巨变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32 页。)然而,坚持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思想家的革命理论往往能为群众的自发运动指明道路,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实践又能促进历史的发展。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他是从反封建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他毕生为中国的近代化而斗争,“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他为首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以后,一方面运用批判的武器,“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对清王朝实行武器的批判,领导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1 页。)围绕在孙中山先生周围,一大批民主革命的宣传家,他们大造革命舆论,撰写和编译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作,创办了许多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杂志,而且身体力行,大力开展革命活动,翻印和散发革命书刊,奔走呼号,冲破了封建舆论的一统天下,使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邪说偃旗息鼓,他们的舆论宣传为唤

醒国人投入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洪流确曾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因而使他们成为传颂一时的舆论界的骄子。另外,还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活动家,他们在进行革命舆论宣传的同时,则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清武装起义的战场上,领导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他们奋不顾身,屡败屡战,出生入死,不怕牺牲,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不愧为战场上的英雄。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追随者,从文武两条战线上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作斗争,才加速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与灭亡。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政治派别,都是通过具体人的活动来实现其政治主张的。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对于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对于具体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真相无疑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本书收录的15篇文章论述了14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其中既有革命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人物,也有立宪派的典型人物;在革命派中既有为革命而献身的辛亥英烈,也有曾经在舆论宣传或武装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而后来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辛亥人物;在立宪派中有的人在革命潮流的冲击下曾一度倾向革命,后来又依附蒋介石,有的人在辛亥革命时期顽固坚持君主立宪、甚至于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但后来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下又转变立场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此外,还有的人从晚清的外交官员顺应革命形势、转变立场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人的议和代表,或多或少地为辛亥革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尽管这些人物人生的经历不同,政治态度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与辛亥革命时期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诸如武昌首义、沪宁光复、南北议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等相联系。因此,研究这些人物不仅能使读者对所论述的人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历程和具体活动有清晰的了解,而且对辛亥革命史

的某些重要环节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从而使这部《辛亥人物论集》成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种补充,这也许可以视为本书的一大特点。

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加以选择和考订,以史实为根据,力求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苟求,也不溢美,是本书的又一特点。阅读全书,读者可以看到,本书作者征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所论人物的文集、族谱、档案等等,有些资料是作者第一次发现的;同时,作者还参阅了所论人物的传记、年谱、别人的回忆录、报刊杂志的评论及相关的外围资料等等。引文中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口碑资料,据我所知,文献资料是作者奔波于全国各地从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图书馆搜集而来,而口碑资料则是从所论人物的家乡或活动地区实地调查采访所得,均来之不易。作者对掌握的资料经过反复鉴别,除伪存真,除粗取精,对各种资料记载分歧较大的史事认真加以比较,一一进行了考订,从而纠正了过去许多以讹传讹的错误史事,应当说,论文集集中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言之有据的,是真实可信的。

本书论文作者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其中不少人还具有博士学位。他们的理论视野较为开阔,专业基础亦比较扎实。思想敏锐,思维敏捷,勇于进取,敢于开拓。而且,作者在研究所论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时,往往不局限于知人论事,而是将其置于辛亥革命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不囿于成说,不人云亦云,能提出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因而新见迭出,读后耐人寻味,这或许可以算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吧。

毋庸讳言,由于本书收录的论文多数是青年学者的作品,略显功力不深,文采不足;然而这本论文集还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其中有的论文是以往没有探讨过的全新课题;有的论文发表后引

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来函向作者索阅,更多的论文则是第一次公开面世。我想,本书的出版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拓宽和加深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作用。因此,在辛亥革命 90 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推介这本书,从中也许可以获得某些教益和启迪。

饶怀民

2001 年 5 月 3 日

目 录

序.....	饶怀民(1)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	饶怀民(1)
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及其基本特征.....	饶怀民、吴科达(17)
民主革命的宣传家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士钊.....	饶怀民(31)
论辛亥革命时期杨毓麟的民族主义思想.....	李 月(51)
“祝身化作千百亿,日日东西南北之”	
——“热血诗魂”宁调元生平事略.....	唐建明(83)
马君武与辛亥革命.....	张朝晖(109)
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的民族主义思想述评.....	李 霞(137)
黄兴功过辨析.....	饶怀民(161)
吴禄贞与武昌首义.....	龚丽琴(173)
沪宁光复前后的李燮和.....	赵立彬(198)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	
——以第一次督湘期间的活动为中心.....	王艳玲(227)
伍廷芳与南北议和.....	梁 建(257)
李烈钧与“二次革命”.....	黎建军(288)
蔡锷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	阳信生(314)
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述论.....	孔伟红(354)
后记.....	(379)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

饶怀民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家,以无与伦比的勇气,率先揭橥批判的大旗,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同时,他作为革命活动家,又以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对封建专制制度开展了武器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又经过详尽的调查、缜密的思考,制定了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近代化蓝图。因此,探讨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与反封建的关系、探索孙中山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内容、特点及其局限性,不仅对于研究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有积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余毒,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提出以民权代替君权的革命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是从阐述民权主义而发其端的。

孙中山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那么,君权时代怎样才能演变为民权时代呢?孙中山认为,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由于“君主专制一天厉害一天,弄到人民不能忍受。到了这个时代,科学也一天发达一天,人类的聪明也一天进步

一天,于是生出了一种大觉悟。知道君主总揽大权,把国家和人民做他一个人的私产,供他一个人的快乐,人民受苦他总不理睬。人民到不能忍受的时候,便一天觉悟一天,知道君主专制是无道,人民应该要反抗。反抗就是革命”^①。孙中山正是从反抗君主专制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毋庸讳言,孙中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相距甚远,但他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并大胆探索其发展规律却是值得重视的。他把由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看成是一种“世界的潮流”,如同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无论是怎么样都是阻止不住的”。^②既然是潮流,当然不依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顺应世界潮流,才能取得成功,在中国实行民权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最终必然会取得胜利。

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并非主张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在倡导民权的同时,也承认过去所谓“神权”、“君权”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从前人类的知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在那个时候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③。因此,他认为神权和君权都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曾在历史上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将其说成一开始产生就是反动的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只是到了近代,神权和君权才成为“过去的陈迹”,成为历史发展的严重桎梏,社会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是从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来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孙中山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涉及的范围极广,内容相当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为此,孙中

山对君主专制在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批判。

首先是对君主的批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君主是封建专制的总代表,是一切罪恶的渊藪。“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有所欲为”^④,中国的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专制暴君。孙中山在分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端专权,“把国家的什么权都拿到自己手里,专制到极点,好比中国秦始皇一样”^⑤。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君主统治中国,皇帝与人民的关系一直是主奴关系,“只有皇帝一个人是主人,人民都是奴隶,人民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⑥。可以说,“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的奴隶”^⑦。人民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人民“惟有兢兢遵守而已”^⑧。官吏任免权完全操纵于皇帝之手,“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⑨。在皇帝的淫威之下,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分开的,人民虽然没有政治权利,但却有交纳赋税的义务,孙中山指出:“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牛马不相及之别。政府与人民之交涉,只有收纳赋税之一事,如地主之于佃人。”^⑩就皇帝本身而言,其权力与能力也是极不一致的,孙中山认为,君主虽然权力很大,但是有能力、有道德的人却不多,“历代的皇帝,只有尧舜禹汤文武有很好的本领,很好的道德,其余都是没有本领、没有道德的多,那些皇帝,虽然没有本领、没有道德,但是很有权力的”^⑪。由于绝大多数皇帝有权力而无能力、又无道德,人民对皇帝的不满便与日俱增,为防止人民的反抗,君主便欺骗人民,“每每假造天意做他们的保障,说他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是天所授与的,人民反对他们便是逆天”^⑫。他揭穿了这种“天子受命于天”的谎言,指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在民权时代,天下人人皆可为皇帝,“这四万万人都是皇帝”。^⑬君主虽然没有多大能力治理国家,但对于保守自己的皇位却是特别注意的,皇帝除穷奢极欲地享乐之外,其主要精力便“是要保守他

们自己的皇位，永远家天下，使他们子子孙孙可以万世安享。所以对于人民的行动，于皇位有危险的，便用很大的力量去惩治。故中国一个人造反，便连到诛九族，用这样的严重的刑罚去禁止人民造反，其中用意，就是专制皇帝要求永远保持皇位”^⑧。孙中山对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不理民事”的世袭皇权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说：“除非有人把他推翻，才不能世袭，如果不被人推翻，代代总是世袭”^⑨。他号召人民起来用武力推翻这种长期统治中国的世袭皇权。

其次是对帝王思想的批判。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力陈帝王思想的危害，谆谆告诫国人，绝对不可有帝王思想存在。他说：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立志要入学、中举、点状元、做宰相，并且还有要做皇帝的。譬如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项羽都看见了，便各自叹气，表示自己的志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两人的口气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丝毫没有分别。换句话说，都是想做皇帝”^⑩。这种思想，代代相因，到了元朝，朱元璋“推翻元朝异族的政府，把政权拿到自己手内，改国号为明朝，还是自己做皇帝，政体还是专制，把天下的政权，由父传子，子传孙，一家之人，代代相传，正像古人所说的家天下”^⑪。洪秀全也是如此，他失败的最大原因也“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通过天京变乱，“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⑫他得出结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⑬孙中山反复提醒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

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便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③。因此，“从前做皇帝的思想，是过去的陈迹，要根本的打破他”^④。为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帝王思想，杜绝历史上“总是争皇帝”事变的重演，孙中山在与黄兴等人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规定：“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⑤

再次是对腐败官僚政治的批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以皇帝为首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至清代，这种官僚系统越来越臃肿，官衔越高，特权越大，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固宠，以致草菅人命、贪赃枉法之事，“在地方官府中，举目可见”。正如孙中山所揭露的，“有权有势之家，奔走效劳之辈，仅因为个人仇怨，就可以捏造罪名，把人抓到官府，要求惩治，被陷害的人，还是无法上诉，无人辩护，只得面聆诬控。如果否认，就拷打三日，三日之后，仍不认罪，就依据原告的权势和官府需要息事宁人的程度，决定严惩。凡是被指控的犯人，从少许偷盗起，几乎一律处斩。斩首既可节约监狱开支，又可制服被告”^⑥。这种苦打成招、动辄处死之事所在多有，法律徒具空文，冤狱遍于国中，“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贪婪勒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⑦。由于官衔是用钱买来的，所以，清政府不可能要求法官依法办事，而是“任法吏之妄为，丝毫不加限制”^⑧。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那些罪大恶极者逍遥法外，而使那些无辜良民难逃厄运。对此，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内自朝廷以至奄[阉]竖，外自督抚以至胥吏，皆以贪赃为能，以害民为事。”^⑨更有甚者，有的官吏还把制造冤案作为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地方官出而任职，首先查明富庶之家、献媚之徒与抗逆之人。其视为异己者，则强迫亲己者诬以罪名，逮捕入狱。”然后处以罚款或抄没家产，以达到“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的目的，这些人往往

“以刑狱致富”。^②贪污贿赂成风是腐败官僚政治的重要表征。在清末社会,可以说无官不贪,无处不贪,无时不贪。孙中山举例说,“中国官界,每逢生日,其所属必集资以献。时两广官场以值李督生日,醖金至一百万两以充贺礼;此一百万两者,无非以诱吓兼施、笑啼并作之法,取之部民较富者。而同时督署中,又有出卖科第、私通关节之事,每名定费三千两”^③。那些想当官的士人,也乐意行贿当道,“士惟以科第为荣,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入官之望;于是纳贿当道,出而任事”^④。他们上任伊始,便充分运用自己的职权,抓紧时间搜刮民脂民膏,“为官一年,则尽一年之力以括削,为官一月,则尽一月之力以括削,故罢官以后,无不满载而归”^⑤。

孙中山分析官吏贪污的原因时指出:主要是为了满足奢侈生活无止境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保持自己原有官位并进一步牟取更高官位的目的。“彼既不能以官俸自养,而每年之贡献于上官者又至多,虽欲不贪安可得乎?况有政府以为其贪墨之后盾,自非痴骇,更安肯以清廉自矢?”^⑥因此,贪污是环境“诱惑所产生的结果,是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惟一的可能条件”,“要作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并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完全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⑦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孙中山对此表示深恶痛绝,他指出:“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厥的主要原因。”^⑧正是由于官吏贪污行贿,谋取私利,疏于管理,懒惰无知,以致水利失修,灾荒连年,瘟疫流行,饥谨交集,“盗贼横行”,“民不聊生”。^⑨孙中山斥责贪官污吏为“民贼”,把保护这种腐败官僚政治的清政府比喻为一堆散发着臭气的粪土和垃圾,“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扫除清政府这堆藏污纳垢的粪土和垃圾则是革命党人的责任。

皇帝为所欲为、皇权思想泛滥成灾、官僚政治腐败透顶,所有

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因此,要消除上述社会弊病,就必须消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特别强调“政治革命”的重要性,他在谈到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⑤可见,他是在中国完成政治革命作为实现近代化的前提和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

第二,批判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提倡“开放主义”、发展实业是近代化的核心。

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直接阻碍了经济近代化,对此,孙中山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对闭关政策产生的原因、表现、危害及解决办法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孙中山认为,闭关政策是统治者与人民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传统的虚骄自大心理的反映。清政府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极力反对从西方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害怕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会带来“人心因之瓦解”的恶果,只有使“内外隔绝”,永远使“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⑥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⑦。统治者历来“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故从来若欲有所改革,其采法惟有本国,其取资亦尽于本国而已,其外则无可取材借助之处也,是犹孤人之处于荒岛”^⑧。这种荒岛孤人的思想在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上明显地反映出来。“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地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塞野,天赋知能,艰于发展,愚民自锢”^⑨,作茧自缚。与外国正当的商务往来被取消,“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以通商”,进出口贸易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作为清廷重要财政收入的海关关税无由收取,只得在国内设关立卡,强抽重税,用以填补国库的空虚,征税多如牛毛,“自柴米油盐以至糖酒诸杂项,皆科重税;居陆则有房捐,居水则有

船捐”^④。”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⑤。”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到(遍)地风波，满天荆棘。”^⑥这样必然会“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工业之繁兴”，使“天然富源迟迟不发”，“地不能尽其利”，“货不能畅其流”。孙中山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封建专制皇帝就像一个“不善治家”的“富家翁”一样，其家境本来是极富裕的，但由于不善治理，“田园则任其荒芜，财宝则封锁不用，子孙则日事游荡，而举家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⑦孙中山详细地分析了导致一个国家贫弱的四大内因：“有以地小而贫者，有以地瘠而贫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而中国恰恰在这四个方面皆有致富的有利条件。“中国之土地则四百餘万方哩之广，居世界之第四，尚在美国之上。而物产之丰，宝藏之富，实居世界第一。至于人民之数则有四万万，亦为世界之第一。而人民之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四大贫弱之原因，我曾无一焉。然则何为而贫弱至是也？”^⑧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所致。他用中国历史上的唐代与清代进行比较，说明实行开放主义可以强国的道理。他说：“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如意大利、土耳其、波斯、日本等国是。彼时外国人到中国来，我中国人不反对，因中国文明最盛时代，上下皆明白开放主义有利无弊。”^⑨孙中山把能否实行开放主义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这是很有见地的。在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害的事情很多，但最主要的事是促进经济发展，“实业发达”；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⑩面对当时存在的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等困难，他极力主张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实行开放主义来解决面临的窘境。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